

第五章 语言的桥梁

语言是重要的。如同堤坝毁于惊涛，战败的日本被语言的狂潮所席卷。168
粕取杂志与颓废文学，不过是这条信息大河中的几股涌流。语言使人们活跃生动起来。他们跨越语言的桥梁，从过去走向未来。

熟悉的语言和口号缓和了战败的冲击，使人感到一种与过往相连的宽慰，即便这些语言的意思与战前相比已经完全颠倒。讽刺战败的笑话十分流行，成了消除绝望感的武器。欢快、深情的抒情歌曲照亮了人们的生活，鼓舞着未来的希望。收音机普及到每个家庭，带来了由美国改革者精心引导、丰富多彩到令人吃惊的新节目。然而不协调的政治宣传也充斥其中。严肃出版物盛行，传播着自由主义和左翼的思想，还有各式各样的译著，足以使旧日的思想理论家们气急败坏、咬牙切齿。

从战争用语到和平用语的转换，成为整个社会从战争向和平转变的混乱过程的一部分，往往揭示出“从战争到和平”的本质。先前的刀剑武器制造者开始生产刀叉餐具，钢盔被改造成了煮锅。一个制造机关枪的工场，进行了重新设计以便生产缝纫机。出版商们，面对严重的纸张短缺，想出了利用以前制造风船炸弹（气球炸弹）的工程，生产廉价的169
再生纸。到1946年末，神户元町著名的商业街，利用以往飞机制造场的金属和防弹玻璃等原材料，进行了充分的再建。

在这个过程中，昔日的敌人完全成了新的目标。原来一直为生产军用镜头服务的光学技师，设计了一种以占领军士兵为目标顾客的“ベビー・パール”（Baby Pearl，小珍珠）相机。先前为中岛飞行机（现在更名为富士重工业）制造战斗机的设计师，根据美国的军用摩托模型，并

利用“银河”轰炸机尾翼的机件，生产出了一种小型摩托车“ラビット”（Rabbit，兔子）。昨天被目为怪异、不适的美国式的嗜好习惯、礼仪风俗，今天在日本小企业家们眼中却大放异彩。在日本投降后一年之间，大约就有400家公司在生产口香糖。

战败后仅数月间，迎合征服者节日需求的新买卖就开张了。到1945年11月，小企业家们已经通过配给系统获得了足够的纸张，来满足美军士兵对异国情调的圣诞贺卡的需求，以便他们发出“来自东京的问候”。大约总共印制了550万张贺卡，大多都是日本传统木版画冬日景色的复制品。对美国大兵以及他们在美国的亲友们来说，现在的情形与几个月前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现在的日本风景处处点缀着寺院神社，不再到处是烈焰硝烟；雪中撑着阳伞的优雅艺伎，替代了藏在热带丛林中的猿人。

美国士兵对香烟的需求，几乎立即得到日本政府的满足，因为政府有烟草专卖权。政府特地生产了三种占领军专用的新品牌，都是用罗马字做招牌：Rose（玫瑰）、Salon（沙龙）和Gion（祇园，京都著名的歌舞伎町）。本土的酿酒商，几年前还在为最初日本大胜“鬼畜米英”举杯相庆，现在也很快推出了一种醇香的美酒，贴着友善、可靠的标签：“白兰地六年佳酿·占领军用特别酿制”。¹

家庭主妇们也热诚欢迎进驻，哪怕不是占领军大兵们本人，至少也是他们的词汇和食物进驻了厨房。1946年中期，大米配给取消，宣布了“食面粉时代的到来”。大阪的一家电气公司响应挑战，推出了一种广受欢迎的用具“ホームベーカ―”，即（日式英语）“家用烤炉”。这种器具由一个内镶金属薄板的粗糙木箱连接电线而成。倒入奶油面糊或者玉米粉（这可是承蒙美国的粮食援助，使日本人获得新口味的大事件），然后就成了——尽管家用烤炉有时出人意料地飞溅蓝色的火花，那也会被认为是美的享受。最初的广告词宣称，这是“厨房文化的第一步——一台不需要木炭、瓦斯或电炉的面包机”。²

当然，做面包是生存所必需的。同时，它也是日本民众社会的西化渗透于每个角落的小小例证。另一个例子是制衣业的繁荣。很快，裁制西式服装不仅成了一门吸引人的实际技能，而且成了从战争年代的单调贫乏与反西方主义中解放出来的象征。裁缝学校、时尚杂志、五花八门

的服装设计书，像花朵在废墟中绽放。1946年初，当设计师杉野芳子决定重新开办她的女子缝纫学院时，她只准备了30张报名表。到了学员报到的那一天，她震惊地发现，在学校的大门外，“一千多名”妇女正耐心地在寒风中排队等候。像杉野这样的连锁学校，迅速遍及全国。美国妇女色彩艳丽、样式大胆的“醒目服饰”，成了许多有能力消费时尚的日本女性风行的装束，以及那些仍然穷困的日本女性的梦想。³

对战败的嘲弄

随着对和平生活的迅速适应，出现了许多机智诙谐的说法。日本军服，在战败数年后依然是日本男子的穿着，被重新命名为“败战服”。同样，军靴成了“败战靴”。到1945年10月，日式的黄铜烟斗已经在黑市上出现了。烟斗，据说是日本战后生产的第一样产品，大约10厘米长，有一个很小的烟锅，是用机关枪的子弹夹和高射炮的炮弹壳做成的。它们流行的名称叫什么？当然是——“败战烟斗”。⁴

这种冷嘲热讽，帮助日本人减轻了战败的痛苦和耻辱。而且，嘲笑战败的确成了即席的日常功课。没有什么神圣的。感伤的童谣被歪曲传唱，最甜美的童谣“夕焼け小焼け”（大落日，小落日），歌词被篡改成了“大闇小闇”（大黑市商人，小黑市商贩）。一篇十四世纪著名的落书——《现在京都流行什么》，被改头换面，变成了东京眼下不安定生活的写照：从持枪的歹徒和变色龙式的官员，到“一削就断的铅笔”和“一拧就弯的螺丝”。⁵众所周知的陈词滥调，被恶意地进行废物利用。¹⁷¹“感谢我们的战士”，这句战争年代最虔诚的话，一夜之间成了对日本陷入今日之困境的怀恨的、憎恶的批评。以一种不寻常的、冷酷的旧瓶装新酒的做法，《朝日グラフ》周刊在1946年正月号上刊登了一幅照片：广岛上空的蘑菇云，附上了一个现成的老标题：“从谎言中浮现出真实”。这种对不讲信誉的意识形态理论家与军部领导人显而易见的蔑视，十分典型。⁶

每年的新年庆典，成了嘲笑战败的绝好时机。因为自古以来，日本有新年玩纸牌游戏的习俗。伊吕波纸牌，就像是字母和单词的配对游戏，如A是apple（苹果），B就是boy（男孩），然而却有更加宽泛巧妙的对应。比如，A对应“所有（All）发光的不一定是金子”。按照发

音，日语可以被划分为大约 50 个基本音，这就意味着，每个新年，语言滑稽大师们可以对当今世相进行多达 50 种的讽刺挖苦。

这些笑话、双关语和谚语很难翻译成英语，但是它们却为艰难时世中的许多人带来了轻松快乐，尤其是战败后的伊吕波纸牌的游戏规则，与战争年代的庄严隆重相比，形成了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对照。有几个例子或许可以传达出些许这样的感觉。对“す”这个音，战时的伊吕波纸牌，用一句口号“前进日本，光耀地球”来对应，并配上一幅在晴空下迎风飘扬的太阳旗图案。与此相对照，战败初期，代表“す”这个音的成语是“道义低下，战争喧哗”，纸牌图案是两个衣衫褴褛的遣返士兵在相互斗殴。与此类似，战时代表“お”音的，是爱国标语“母亲参加国防妇人会”，纸牌图案是一个男孩跟妈妈挥手再见，手里举着一面小国旗。在战后的版本中，与“お”音相配的话是“父母和孩子全都营养不良”，纸牌图案是一对瘦弱的母子，手拉手。谁看到这样的语句和图画，都会流露出悲哀、苦涩的笑意。

172 随着日本被占领的延续，这种战败笑话的语言游戏迎来了一个又一个新年。譬如，1946 年的一套漫画纸牌，用一句大胆放肆的“神风（特工队）吹不起来了”表示“か”音。一年之后，在失控的通货膨胀过程中，出现了“か”音的另一富于灵感的对应版本：“穷时偷盗，富时挥霍”。1948 年的新年，“れ”音也有精妙的谚语配对：“知礼方为文化人”，其中的玄机在于相配的插图中，画中一位美国大兵正在神社前鞠躬。⁷

从天上投下礼物的胜利者们，从没有真正想到，会有如此流行的关于战败的玩笑存在。但是这种讽刺的智慧本身，并非一定是针对胜利者的目标。当然，这样的破旧立新，也绝非是对某些“民主”讯息的敌视。只不过是发出自己独有的声音罢了。

光明、苹果和英语

在裕仁天皇战争动员下的国度里，是不能容忍讽刺文学的，也很少有轻松娱乐的空间。这可以帮助解释，为何战败后对解脱和希望最初的、最受欢迎的表达，竟然涉及对一只苹果——禁果的绝对轻浮的赞歌。

战败后数周内，一种乐观的情绪就浮现在出版业、电台、流行音乐和电影当中。媒体继续在谈论“虚脱”，但是同时开始关注当今和想象中未来的“光明”。的确，对“光明”和“新”的强调，成了对所有黑暗和失望最普遍的修辞疗法。当“粕取”文化的提供者和消费者，谈论通过颓废寻找到真实性的时候，其他人则通过强调“光明”、“纯粹”、“解放”的“新生日本”的前景，来批判刚刚逝去的往昔。

在这些年来的许多回忆中，当时希望降临的那一刻，可以被精确地追溯到1945年10月11日。那天又一部不引人瞩目的电影上映了。这部电影有一首旋律轻快的主题曲《リンゴの歌》（《苹果之歌》），抓住了每个人的心。这首歌开始的歌词很空洞：

我唇边的红苹果，
蓝天默默地望着。
苹果不说一句话，
但苹果的感觉明白不过。

然后是反复句“苹果可爱，可爱的苹果”，随后是三小节极为拖沓、更加空洞的歌词。歌曲结尾：

让我们唱苹果之歌好吗？
如果两人一起唱，多快活。
如果每个人都唱，就会越来越快乐。
让我们彼此传递苹果的感觉——
苹果可爱，可爱的苹果。

《苹果之歌》，开启了一位年轻的女演员並木路子的演艺生涯。路子在战争年代的经历，跟她的许多崇拜者一样不堪回首。她的母亲在1945年3月15日的东京空袭中，被燃烧弹烧死。而她本人在空袭之后，被从隅田川救起。她的父亲和兄长一去战场而不归。她在松竹电影剧团是个新人，对她本人来说，永远也忘不了拍摄现场时那个苹果的滋味。当时，一个苹果5日元，而一个年轻女演员的月薪只有100到300日元。

並木路子的突然成功，使她成了从艰难时世中挣脱出来的偶像。在演唱会上，她边唱歌边向她的观众们抛掷苹果，而观众们会想方设法接住它们，就像是伸手接住幸福一样。观众们热情被激发出来，当食物是高于一切的考虑时，看到有吃的东西而精神振奋，一点也不令人吃惊。当然，除了美味的暗示之外，这首歌以其轻快无聊放松了人们的心灵，那令人难以忘怀的红苹果、蓝天空的意象，给人们沉闷单调的心理状态增添了一抹亮色。事实上，这首歌的每一位评论者，都提到了歌曲力图传达的“明快”的感觉，甚至是“非凡的明快”。《苹果之歌》的狂热，作为战后乐观主义的催化剂，是否应当得到如此过度的赞扬，已经是题旨之外的事情了。它作为光明浮现（伴随着精疲力竭一道）的完美例证，成了那个时代的符码。对于千百万日本人来说，过去是黑暗的，现在是严酷的，未来则会倍加光明。⁸

有时，这种乐观主义的表达是精心炮制的。战后的出版商，通常会特意供给他们的读者欢快、娱乐的书籍。电影和严肃文章的文体风格，也从黑暗转向光明。甚至有些实际工作，比如教英语，也被精心地与强调积极性的哲学结合起来。《力ム力ム英语》（《来，来，学英语》）是一档非常著名的日间广播节目，始播于1946年2月1日，不仅是因为它的会话课程，而且由于它欢快的主题歌而出名。下面是它的歌词，配合着欢快的日本旧童谣的旋律：

来，来，每个人——
你好，你好吗？
你吃点糖好吗？
一，二，三，四，五，
让我们一起唱支快活的歌，
唱啊，啦啦啦。

此节目的讲解人平川唯一后来解释教育节目采用此主题歌的不同寻常的决定说，其动机在于一种热切的渴望，希望这首歌有助于培育新日本的自信心。他回忆说：“在战后黯淡的日本社会里，我们不可能唱军国主义歌曲，我们需要一首唱起来自信的英语歌，使每个人感到更

光明。”

平川唯一的课程，设计初衷是在传达一种好心情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培育对民主实践的欣赏。这种教学法，也几乎还是停留在黑暗和光明二元论的见解之上。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想在那些岁月里，只有当光明到来，人们的心变得亮堂，而且开始积极乐观地看待未来，才可能重建日本。我真的害怕日本会垮掉，假使情况继续下去，人们甚至忘了怎么笑，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当我被要求做一档英语节目的时候……我把它当成是上帝给我的一次庄严的机会，使日本变得光明”。一切证据表明，《来，来，学英语》达到了平川的期望。节目连续播出了7年，而且有570万个家庭经常收听，随同节目印制了50万套课本。从1946到1952年间，节目收到了50万封听众来信。平川唯一本人，成了非常受人尊敬的名人。⁹

这些光明、民主的社会景象，与战争年代意识形态理论家们的沉闷说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战时说教和价值观的某种弹性，使得人们有可能在追求光明的新希望的同时，不至于目迷五色。语言——暧昧、感性和召唤式的最为俗套的话，实际上成了人们从军国主义的过去向和平的未来过渡的桥梁，同时又仍然保持了亲切感、连贯性，甚至是某种一体性。

“光明”本身就是一个好例证，无论是其词汇、意象还是含义—— 175
明亮、光辉，照耀的旭日、明晰的目标、纯粹的动机，在战争年代曾无处不在。比如，1941年7月，对中国开战的4周年之际，政府以数不清的标语口号，激励日本人民坚持到底。这些口号包括：“一亿人战，光明强大。”1943年一句更为简洁有力的口号，号召日本人“消灭美英，建立光明的世界版图”。层出不穷的标语口号，试图在战场和后方灌输光明的姿态和信心，并将日本塑造为全亚洲光明的希望。（“亚细亚之光”，就是日本在东南亚使用的宣传口号之一。）当尾津组的老板开设“新宿之光”黑市时，他对于从战争到和平时代的过渡，真可谓驾轻就熟。¹⁰

作为日本最大的出版商和战事的热心支持者，讲谈社同样通过强调积极的方面应对战败。据一位编辑回忆说，讲谈社决定，人们真正想看和需要读的，不是关于战争正面的、深刻自我反省的大部头，而是“娱

乐的小说、愉快的小说、明快的小说”。然而讲谈社的班子，不过是在重蹈它长期以来的出版方针路线而已，避免严肃认真的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1931年，日军侵占“满洲”后，正是这家出版社，采用了这样的口号：“光明正义，尽我所能”。¹¹

战时的修辞用于战后的客体对象时，被证明相当富于弹性，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本来就是建设性和理想主义的。日本人尚未出发去打仗时，高喊着“军国主义万岁！侵略万岁！”他们宣称，他们是为和平与安全、共存与共荣、他们自己的国家和全亚洲更加光明的未来而战。胜利的同盟国、粕取分子阶层和政治左翼通常宣布，这些全是谎言。然而，更为普遍的反应则是：战时的宣传说教，反映了正当的甚至是高尚的理想，但是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我们悲惨地被领导者欺骗和误导了。以这种观点看来，这样的想象成为了可能：或许那么多人曾愿意为之献身的理想，也可能会协助一个繁荣与和平的新国家诞生。至少可以辩解说，这些为国奉献的言论主张，并不仅限于战争中为国尽忠而已。¹²

1947年初，一位小学一年级老师提供了如下例证：同样的词语或文本，在战败前后可以有如何不同的解释。他向新闻界描述，儿童文学经典、战时宣传家们喜爱引用的“桃太郎”故事，如今在他的课堂上是如何被运用的。在战争年代，桃太郎被看作是一个国家主义的寓言：一位神圣、精干的日本英雄，从魔鬼（英美敌人）的手中拯救了国家，并且带着战利品——敌人的宝物，凯旋而归。这位教师写道：战后的孩子，相比魔鬼而言，更关心的是宝物；而且由于战后的课本里没有插图，使得他们总在揣测宝物是什么。孩子们推断说，肯定是钱和食物。当被问到该如何处置宝物时，他的学生们讨论得不亦乐乎，这本身就与战争年代的课堂形成了鲜明对照。最终38票赞成，2票反对，孩子们讨论决定，宝物应当平均分开，并且分发给穷人。¹³

这些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政治宣传标语、政治意象，甚至是完整的文本，在本质上既非进步也非反动。然而，这种熟悉的语言的连续性传达出某种稳定感，在沉重的压力之下与不寻常的巨变面前，它起到了心理安慰剂的作用。有时刚刚过时的言语措辞，与战败后新的议程十分吻



战后最流行的政治宣传标语是“建设和平国家”，这句话当然也是学童们书法课上必须练习的。这是当年12岁的皇太子明仁的书法。明仁亲王于1989年承袭了他父亲裕仁天皇的皇位。

合，可以精确地合榫。战败初期最常见的两个口号：“建设和平国家”与“建设文化国家”，复活了战时宣传的两大关键性主题“建设”与“文化”，并且将其转化为创建民主主义、反对军国主义原则之国家的召唤。全国各地的学童们，将这些口号作为书法课作业的一部分，不断重复摹写。甚至年轻的皇太子明仁也加入了这种训练。¹⁴

由于这些反战观点，反映了成千上万为战争所苦的日本老百姓的心声，“建设”和“文化”这样的字眼，是如何牢固根植于战时言论的，就很容易为人所忽略。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最大的战斗口号，就是“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对中国和西方同盟国的战争，也一直伴随着这样的口号，譬如“集大和一心为建设”，“人人奉献为建设”。同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早期的标语口号炮制者们，也大打“文化”牌，通常与明亮、光辉的意象相联系。“日出之国，优秀文化”，

是中日战争中的典型口号。珍珠港事件之后，意识形态理论家们甚至更加直白地强调，日本发出强大的、新生的文化之光。1942年，“皇道文化，东亚之光”的战斗口号登场。同年，另一口号宣称，日本正处于创造“与光荣历史连结的新文化”的过程之中。¹⁵

政治宣传的标语，就像是一只手提箱，总是等待着腾空旧玩意儿，装入新物件。

熟悉的新世界

战时标语口号最常用的恳切字眼，比如“协力”、“竭力”等等，也成了战后为重建、和平、民主或者新日本而奋斗的政治宣传的主要用语。然而，这种“崭新”的措辞本身，却最多地暴露出了许多“新的”口号和说教，实际上是多么陈旧和熟悉。这种对新的崇拜无处不在。仅在出版界，战后的头三年就有超过一百家新出杂志，在它们的刊名中使用了代表“新”的字眼，不管是“新”这个字，还是其形容词形式“新しさ”（新的）。许多杂志，在刊名中甚至使用了表示“新”的英文
178 词“new”。从这些杂志感兴趣的话题中，可以揭示它们是如何热切憧憬“新”的祝福。其中，读者们可以迎来一个新时代、新文化、新民主、新教育、新地理、新历史、新希望、新劳动、新生活、新电影、新社会员工、新学校、新诗、新体育运动、新路、新女性、新世界、新生民主佛教、新文学、新俳句、新式婚姻、新自治、新世纪、新自由、新自由人、新社会、新科学、新农民、新农村、新青年、新警察、新式家族、新式美容，甚至新的幸福之星。¹⁶

然而，正如战时口号“与光荣历史连结的新文化”所显示，“新”，像文化和光明一样，一直是日本帝国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之一。但是这种对于变化的重视，由于西方宣传和日本自己竭力强调战前文化和政策的“古老”、“传统性”或者“不变”的方面，而往往被遮蔽了。事实上，革新是战争年代的核心理想之一，正如迅速变革一直是千百万日本人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口号。

从日本的立场看来，战争岁月是一种摆脱现状的尝试——克服世界经济恐慌并赶超西方更先进的工业经济。1931年后，由于国家动员“总力战”（全面战争），而且战时倡导的“建设”目标明显是革新主义的，

人民生活发生了急剧转变。在国际方面，这种观点，正如纳粹的“新秩序”，被凝练地概括为“东亚新秩序”，或者是“新东亚”。在内政方面，革新主义的观点，体现在1940年第二次近卫文磨内阁提出的“政治新体制”和“新经济体制”的理念之中。理所当然地，天皇陛下的臣民被期望欢呼雀跃地拥护新的政策。正如1941年的一句口号所言：“新体制——永展笑颜”。¹⁷所有这些，为战后改革的必然性甚至需求提供了理由，使得人们接受起来更加容易了。

总而言之，“变化”本身具有惯性。日本人并不习惯于维持现状。相反，从1860年的明治维新时代起，他们就卷入了变化的风潮。战争年代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加速的进程。危机感增强了，对现状的不满也加深了。当战争在灾难和彻底战败中结束，显而易见“新秩序”和“新体制”的构想是完全失败了。不言而喻，看来对新民主体制和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新的地位的追求，还得继续下去。

这一点并不复杂难解，只是通常被忽略了：革新和破除旧习的力量，与对传统的敬意、对权利的顺从一样，都深深植根于日本人的意识当中。几乎整整一百年，日本人被训练着要预见并适应急剧的变化。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们已经准备停当——不仅是由于战争的恐怖和显而易见的失败，而且是过去长期训练和战时猛烈的国民教化的结果——以继续对“新”日本的探索。换言之，这完全是日本“传统”的做法：在投降后不久就集结有识之士，参与到“‘改变世界’的座谈会”中来。¹⁸与先前大不相同的是，人们将会选择如何定义这个新的世界。

在其他的许多方面，将以前熟悉的言辞和先入之见加以转化，也缓和了从战争到和平的过渡之紧张。战后对于“忍所不能忍”的坚守，源于日本的弱国意识和受害者意识，先前曾出现于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抛开其现代化的伪装，可以追溯到西方列强的炮舰外交和不平等条约强迫日本摆脱封建的闭关锁国时代。战时妖魔化的“鬼畜米英”的提法，使人能够轻易理解战后新妖魔化的转移——改革主义早期激进的“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封建余孽”提法，或是此后“邪恶的共产主义者”，以及左翼眼中“邪恶的美帝国主义者”的说法。战时对“至纯”的强调，则导向了战后净化、清除和矫正的价值趋向。正是

在这样的社会情境中，不但对于最高层战争罪犯的审判和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清查，而且全面的改革主义政策对政治和社会上“封建的”和“军国主义的”残渣余孽的清除，都获得了民众广泛的支持。甚至“阴谋论”，在战争与和平年代之间，也具有某种安慰的、至少是熟悉的连贯性。战败之前，日本人被灌输说，他们的痛苦一方面源自西方帝国主义的阴谋，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狡猾的共产主义者。只需稍微转念一想，日本民众就不难得出结论，真正的阴谋家是日本自己的军阀而已。

更多显而易见的过去的、尤其是军国主义时期之前的遗产，促进了民众情绪微妙的转换，有助于民众怀着某种延续性和希望考虑未来。例如，保守派与进步的反军国主义者，都会指出许多战前时期的“民主”先例：1868年的《五条御誓文》，明治新政府宣誓一扫封建时代的“陋习”。受英美激发的“文明开化”和“自由民权”理念，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繁荣昌盛起来。君主立宪的实践早在1890年就已经开始，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出现了政治上更为多元化的时代，即裕仁天皇父亲的统治时期“大正之春”。对更为激进的人来说，战败和保守派暂时的混乱局面，为左翼传统的复兴提供了契机。1946年5月1日，当25万人在皇居前的广场上集结，宣言庆祝日本的第17个劳动节，也不过是对1936年以来被压制的传统的恢复而已。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语言和历史，功莫大焉地成了协助民众投身于“新”日本前景的资源。

出版狂潮

尽管投降后的数月甚至数年间，真实的饥饿占据了多数人的心思，但是其他的饥渴也困扰着他们。其中引人注目的，是超出标语口号的炮制之外的对言论的渴望。在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统治下，言论自由受到了激烈的压制。通过审查的精神食粮少得可怜。尽管有巨大的困难，出版业是战败后日本最初复兴的商业领域之一。

这一领域的发展令人印象深刻。出版业的繁荣表现了知性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的胜利，因为审查制度和物资匮乏仍然困扰着出版者们。在军事占领下，相当可观的题材皆被划为禁区，包括对同盟国及其政策的批

判，以及对任何被胜利者视为军国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价值观的赞美。许多印刷工场被毁，启动资金又短缺。资金不足，是想要从事出版行业的人最常见的难题。直到1951年，纸张仍然严重短缺，并且受制于复杂繁琐的配给制度。尽管如此，出版业的复兴仍然迅速而充满活力。¹⁹

枯燥无味的统计数据，传达出对印刷铅字的饥渴感。战争结束时，日本大约有300家出版社。8个月之后，上升到将近2000家。1948年达181到巅峰，大约有4600家，半数以上没有捱过第二年的行业不景气。虽然如此，1951年当军事占领接近尾声时，仍然大约有1900家出版社在营业，超出1945年8月的6倍。²⁰

至于杂志，由于出版状况实在混乱，确切数字无法统计。许多期刊在战败的混乱中暂时停刊，但数周或数月之后，又重新摆上了报摊。另外有些刊物，曾被军国主义者禁刊，战后又恢复起来。还有些杂志，通过迅速地改头换面，实现了从战争到和平的转变。例如，昔日的《战时女性》，成了《妇人画报》；《战时青年》重新命名为《建设青年》；《战时经济》干脆利落地解除管制，成了《投资经济》；而《战时医学》依照战后惯例，成了《综合医学》。本着同样的精神，《经国》变成了《新时代》；《兵器技术》快速转化成了《和平产业》；而《机械工之友》经历了不可思议的改换，以《新论》的名目重新登场。一家战时宣传机构“青年文化协会东亚文化圈社”，当然需要有技巧地变脸，竟然以“新日本建设文化联盟”的名义重新露面，并且将它本社的帝国主义旗舰刊物《东亚文化圈》换掉，给新刊物取名为《文化》。它敦促读者加入遍布全世界的“同志”行列，“驱逐”身外和心内的“文化之敌”。²¹

有些杂志名称的变更，就像是女性在婚姻解体后，重新用回少女时代的娘家姓名。1943年，当讲谈社决心尽全力获得“思想战”的胜利时，它的发行量很大的杂志《キング》(King)，被改成了《富士》(最富于召唤性的国家主义的象征之一)。投降之后，《キング》的刊名又重新启用。这种现存杂志的停刊、复刊和改名引起的混乱，加上真正的新兴刊物的遽然出现和同样突然的消亡，使情形变得愈加复杂。同时，许多以地方读者为目标的小型杂志，在全国的出版统计中受到忽视，其实有些质量颇高。²²

据估计，从日本投降到1945年年底，有近200种不同的杂志出现在182

全国各地的报摊上，其中有六七十种是新创刊的杂志。1946年上半年，至少增加了400种刊物，其中大约85%是新刊。此后，刊物的数量呈指数性增长。单是1946年一年，就约有114种专门的女性杂志。从日本投降后到1949年末，占领军总司令部的审阅部门，审查了大概13000种不同的刊物。同期，日报的发行量从1400万份，增加到了2660万份。在这一领域，盟军最高统帅部热心的审查官们，在1945到1949年间，共计审查了大约16500种不同的报纸。²³

书籍的出版，同样显示出未受“虚脱”状态的影响。到1945年底，将近出版了1000种新书，其中包括许多在军国主义时代受到镇压的作者的书籍和题材有禁忌的书。截至1949年下半年之前，被呈交盟军最高统帅部审查机关的书及小册子的总数，接近45000种。据盟军最高统帅部的统计，1945年11月到1948年4月间，约有1367种外文著作被翻译出版，达到每两天出版三种以上的译本。与人们的预期相反，在美国主导的占领体制下，美国作者的书籍只占全部书籍的一小部分（7.6%）。作者名单真正是世界性的，法国作者的著作有350种，德国294种，俄国251种，英国194种，美国104种，中国43种，意大利37种。余下的94种著作，来自其他多个国家。²⁴

尽管相当一部分的战后出版物逃避现实而且昙花一现，但是也有许多严肃和理想主义的刊物。从这一点看来，战后的新杂志和复刊杂志的“发刊辞”，颇具史料价值，因为多数时候，它们的表述早于占领军当局改革议程明确之前。“民主”仍然悬而未决，人们的认知，仅限于泛泛了解《波茨坦宣言》和麦克阿瑟将军初期的政策声明而已。然而，正如对这些早期“发刊辞”抽取的随机样本所揭示的那样，出版界超越政治立场，毫不浪费时间地推出了他们自己对于仍然模糊的民主理念的展望。

在这方面，《协力新闻》的编者相当典型，他们在战后处女号上开始着手重新定义国家的目的。这是一份可以追溯到大正时期的面向劳动者183的刊物，原先的刊名是《奖工新闻》。它在战争时期，致力于鼓吹劳动者协助支持国策。更名后的首期《复兴指针号》，发刊于9月1日，即在密苏里号上举行投降仪式的前一天。以旧形象为新目的服务，它的封面上复制了4年前日本发动对美作战时的一幅画面：人民跪拜在皇居

前的广场上。当然，它打出了新的字幕：“我们已经哭够了，现在让我们微笑着站起来吧。”本期的特写纪事是编辑与一位著名的众议院议员鹤见佑辅的对谈，直率而刺激的标题是：《世界改变了！一问一答——对日本作为伟大的文化国家之再生与对过去总忏悔的思考》。

作为保守派对战败的典型反应，《协力新闻》告诉它的读者们，没有什么经验是没有价值的，甚至包括战败的踉跄尴尬的现实。日本，美国，全世界都应当从大东亚战争中吸取教训。的确，为着未来的和平与繁荣着想，整个世界都必须进行“反省”（这是当时流行的词汇）和忏悔。至于日本人，只能战栗敬畏于天皇结束战争的宽仁之心。同时，必须承认“一亿国民”的全体性，而不只是让东条英机等军国主义者承担“战争犯罪者”与“战败责任者”的罪责。

《协力新闻》的编者激励读者倾注全心于未来。他们认为，“首先，我们需要比美国人多工作三到五倍的时间”，更加努力学习，更加善于创造。战前，据说日本在科学与工业领域比美国落后20年。现在，科技的差距可能扩大到了30到50年，同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也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尽管面对追赶美国的艰难任务，但是只要一亿国民能够成功将万邦无比的历史和文化与适应现实的灵活性相结合，就有希望到达光明的未来。在这里，这份先前的战时宣传刊物的编辑们发现，保留一些他们旧时的宣传言论是可行的：“我们的神国日本，在三千年的青史与冠绝世界的国体之下，拥有头脑聪明、绝对忠诚和道义的人民。尽管我们的环境、素质堪为典范，但是有必要吸收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长处。同时我们也必须摆脱过去的‘模仿追随主义’，尽量做到日本的、日本人的。”¹⁸⁴于此，我们确信战败的日本，能够在文化上胜过战胜的美国，甚至在许多方面能够教导英国。”²⁵

这种在战败的屈辱中，妄图保住一点儿名誉和自尊的态度，在当时是常见的。同样平常的，是坦率地承认失败和必须重新开始。面向年轻女性的杂志《艺苑》，1945年9月复刊号的编辑后记，其坦白和真诚就十分典型：“我们曾经确信是正义的战争失败了，我们编辑的关于胜利的文章成了废纸，而我们年轻的编辑们陷入了绝望。你们读者肯定也是如此。既然你们相信战争，献身于后方的事业流血流汗，不计寒暑、青

春和梦想，想必你们受到的打击更大。”此后编者便直接宣告，“明日之日本”的紧迫要求，不允许沉沦于困惑混乱之中。年轻人尤其面临这样的任务和职责，建设“新日本文化”，建立一个“文化的、和平的国家”。其他的女性杂志则有点五花八门。翌年3月创刊于大阪的地方杂志《新椿》，强烈支持《波茨坦宣言》建设民主和平国家的理念。其“发刊辞”欢呼，从日本放下武器的那一刻起，女性“从一切中”解放了出来。并且号召，从学问中剔除非科学因素，从社会行为的方方面面消除不合理。²⁶

战前一份标题平淡的《经国》杂志，战败后跃跃欲试地更名为《新时代》，也积极探讨日本今后面临的难题。编辑宣称，是昭和不负责任的领导者，背叛了明治和大正的光荣传统。民族道义的颓废和民族骄傲的丧失，是战败的主要原因，正好藉此进行真切的反省。这次的战争可以被看作是反映国民美与丑的一面镜子，最显而易见的丑恶，是封建残余、不合理性与反科学态度，这倒是符合美军声明中对日本弊病的指摘。尽管如此，《新时代》再生的编辑者继续指出，日本国民未能完全理解和吸收“近代文明”。现在到了他们实行的时候了，而且他们应当
185 以自身的能力——自治的创造力赢得自由，而不是仅仅依靠占领军。编辑们的结论是，“即使是在这条布满荆棘的艰难之路上，也有光明和希望，在这一意义上来说，新时代是解放的时代”。²⁷

其他的杂志甚至更加激烈地批判过去。《新生》，一本典型的新生刊物，宣布“虚伪和狡猾的借口在今天再也不起作用了。旧日本被完全彻底地打败了。我们必须心中铭记这一点，并且从这里迈向一个新生的日本”。《新生活》，事实上正是一本新杂志的名字，创刊于11月，封面画是一个高大的美国兵，正在帮助一位上了年纪的日本妇女背重担。杂志的卷首语号召脱去旧的桎梏，直视“战败日本真实的姿态”，并且以真正的批判精神直视一切社会现象，但是同时又重申对祖国的热爱决不动摇。²⁸

到战败当年的年底，在赞美变化的合唱声中，左翼出版物声音嘹亮。12月创刊的《人民》，一份最不遗余力地批判战时知识界参与战争合作的刊物，辛辣地公开抨击军阀、地主、财阀和以天皇为中心的官僚体系。它的编辑宣言，“日本人民正在战争的废墟上受苦受难，但这也

是有史以来他们第一次从压迫中解放出来。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头一次，日本的历史转移到了人民的手中，如此，那么一切都是值得的”。同盟国对日本统治者的痛击，被形容为“世界送给热爱和平与民主的日本人民的珍贵礼物”。像当时大多数评论者一样，《人民》的编辑认为，探寻日本本土的民主萌芽，从政治上和精神上来说都势在必行。他们呼吁，关注明治初期“自由民权运动”以及二十世纪初无产阶级运动中“对民主的热望”。²⁹

大多数声援这些见解的年长的编辑和著作者，都是战前折衷的知识分子传统的产物，他们曾经认真吸取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对他们来说，战败意味着对战时被打断的批判主义传统的恢复，在有些情况下，这一传统比日本的大部分敌人所认为的还要长久。《改造》月刊就是如此，它与同样著名的《中央公论》一起，一直坚持到1944年中期，被天皇政府处分停刊。当1946年1月《改造》复刊时，它的卷首论文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森户辰男的《平和国家の建设》。复刊的评论说，¹⁸⁶ 尽管人们很自然地会将自己国家的行为视为正当，但从客观的立场看来，显然日本过去的态度和行动是“一大团黑暗的野心”，尤其是在对待中国问题上。³⁰

《改造》的复苏，与另一本由岩波书店出版的优秀进步月刊《世界》的出现相得益彰。讲谈社出版面向大众消费的读物，而岩波书店则是以知识阶层为对象，出版严肃书籍的书店。的确，“岩波文化”和“讲谈社文化”，已经成为区别精英出版与大众出版分野的常用语。西方许多伟大作家的作品，包括马克思和十月革命前的俄国作家的作品，战败前都曾经由岩波书店翻译出版。它们中的有些书在战时被查禁了，而大多数作品在战败后重新成为岩波书店的畅销著作。相当数量的日本最尖锐的批评家和进步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岩波书店稳定的作者群体，或者很快聚集到了岩波书店周围。

即便是在新旧杂志创刊、复刊的洪流之中，《世界》的面世也是引人注目的，它的发刊辞很能代表自由主义与左翼的见解。这份新刊物认为，投降是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耻辱，前途的黯淡、混乱和痛苦显而易见。¹⁸⁷ 同时，战败暴露出战争的“无理、虚伪、欺骗和非正义”，为日本人民在立足现实、直面真理的基础上新的开始提供了可能。解除了武装，



对铅字的渴望，被生动地捕捉在了1947年7月的这幅照片之中。读者们睡在东京神田的岩波书店门外，等待购买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的新版全集。人们在发售预定日之前三天就开始排队，两天之中，排队人数增加到大约200人。

丧失了土地，经济自由受到限制，国民被隔绝，他们别无选择，只有努力创建一个“宏大光明的道义和文化”的世界。联想到《圣经》中的比喻，《世界》的编者描述这是“突破窄门”。他们说，前方的路崎岖坎坷，但同时却是条光荣之路。如果战争经验暴露出“我们国家文化的无力，道德的空虚，文化人知识阶级的怠慢、怯懦和不负责任”，那么前方的救赎的任务则是，发展出让全世界都为之赞赏的文化和道义。

到《世界》创刊之时，美国的占领目的已经公开阐明。《世界》的编者将其总结为民主、对个人的尊重、言论宗教自由与世界和平。然后着重强调追求这些理念，不是由于胜利者的命令，而是“因为它们是建立在人性和普遍的正义的要求之上”。虽然任重道远，但最重要的任务是建构一个基于社会公正和国民意志的社会。只有这种社会能够防止专制和独裁再次在日本出现。³¹

这些观点和情绪——痛苦，热诚，严于自我反省，燃烧着理想主义的激情，在投降之后的数百种杂志中都有所表达。

畅销书与死后成名的英雄

战后最初评价很高的畅销书，是一本英文会话小册子，构思于天皇玉音放送的当日。主意是一位叫小川菊松的出版人想到的。这一令人惊

异的成功故事，很快在出版界传为佳话，并且将全国最畅销出版物的记录，一直保持到1981年。

据说，当小川菊松听到天皇玉音放送时，他正在一次商务旅行的途中。来不及擦干眼中的泪水，他就登上了返回东京的列车，立即开始盘算如何在变化的新形势下发财致富。等到火车停靠东京站时，他突然想到了好主意。正如无数灵感降临的情形一样，事情说到底就是如此简单：日本一被占领，人们将会急需一本日常英语会话的小册子。他就卖这个。

小川菊松本人显然没有出众的英语才能，他将创意卖给了出版社。然后他和他内行的合作者们，选取了两本战争年代的会话书作为底本。一本是曾被证实在许多不同的占领情形下都很有效的中日文手册（似乎没有人理会这一情形的黑色幽默）。第二本是日泰文手册。究竟是在一天之内还是三天之内完成了这本小书的全部底稿，说法不一。总之无论如何，这本《日米会话手帐》确实是在小川菊松流泪的一个月之后就问世了。它有32页，而首印30万册几乎立即告罄。

到1945年底，这本小册子卖出了350万本。在全日本，人们都翻开了这本手册的第一页，准备迎接他们的征服者。上面写道：

Thank you!

Thank you awfully!

How do you do!

这些英语词句，不仅配备了日语译文、用罗马字标注了读音，而且还用日文片假名进行了注音。这倒挺有灵感，片假名注音不是精确的、正规的注音方法，却是为日本人的发音习惯着想。手册付梓之前，小川菊松倒是和他的合伙人在酒吧里跟一位喝得醉醺醺的英美人士交流了一个晚上（一说，是三个晚上）。因而，当遇到第一位美国大兵的时候，日本人就能够准备好用日式英语说道：

San kyu!

San kyu ofuri!

最后这句，很明显，是从英语口语的“*Howdy*”与“*Howdy-do*”来的。³²

对日本文学界来说值得庆幸的是，这本令人惊诧的小小出版物，并没有成为后来畅销书的典范样式。尽管文艺批评家倾向于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价值低，但当时出版界的状况，却被证实是一个不同寻常的
189 开放时期，不乏对根本性问题进行的广泛探讨。在曾被军国主义者禁入的各个领域，学术气氛都大为增强，包括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也经历了强大的复兴。曾受到军部压制或审查的优秀文学家，诸如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大佛次郎等人，重新声名大噪。

从1946到1949年的“十大”畅销书，全都传达出这样一种印象：作者的世界性和主题的严肃性都是无与伦比的，普通市民也表现出对思考人性和社会的责任等永恒问题的作品的关注。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这些作品在最广阔的意味上表现出对“生”的关心。³³即便回顾起来，早期的畅销书排行榜总是令人称奇。例如，战后的读者，立即群体转向了最伟大的近代作家夏目漱石（他逝世于1916年）。夏目漱石的作品集的几个新版本，都位列1948年的“十大畅销书”排行榜。在这不稳定的岁月里，夏目漱石的主要魅力在于，他在探询亲密的个人关系中的坚定的坦白直率。爱情事件构成了夏目漱石许多小说的精髓，包括受人尊敬的《*こころ*》（《心》）。

夏目漱石热，看来反映的并不是战争前后的近代历史时期的怀旧之情，而是对新兴的个人的痛苦和安慰的向往。在1914年的一次著名演讲中，夏目已经有力地论说了保持与国家相对的“个人主义”精神的需求。作为一位小说家，他是一个有力的描绘者，描述在遭受无情的狂热变化的国家中，保持个人的平衡和完整是多么不易。在他短暂而又惊人多产的写作生涯中，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爱恋——痛苦、冲突而又不可抗拒，是他后期作品最为关注的问题。

在夏目漱石的世界里，爱总是比社会需求放在更高的位置上，即使它意味着社会放逐，个人的苦恼，或是自我的毁灭。比如《之后》的主人公，通过将自身完全投入到“顺从天意，却违背人定之恋爱”中，成

了英雄（而且是悲剧的）人物。³⁴ 描述一对离群索居的夫妇的婚姻生活的《门》，告诉读者，“当寒冷难以忍受，他们在彼此的怀抱中找到了温暖，只能相互依存”。³⁵ 在这一点上，这位文学巨匠的写作，契合了现在占据许多日本人心思的对私生活的关切。它们也是一个有力的提醒，现在男人和女人们面临的知识和心理危机，并非完全是前所未有的。相反，这只是一个持续的困境的最终阶段——如何在一个创伤的、不可抗拒的“现代化”和“西方化”的时代，定义和断言个人的身份和个性。夏目漱石以无与伦比的敏锐细腻，探讨了这些问题。

夏目漱石绝非是唯一在这些畅销书排行榜上保持超过一年记录的作者。引人注目的是，有几位其他作者也有类似情况。除了范·德·威尔德（Van de Velde）关于婚姻关系的书之外，“十大畅销书”还包括其他三种外国作品的译本：让·保尔·萨特（Jean Paul Sartre）的《呕吐》（*Nausée*）、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的《架空会见记》（*Intervues Imaginaires*）和艾瑞克·马里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的《凯旋门》（*Arc de Triomphe*）。有趣的是，没有美国作者进入“十大”排行榜，直到1949年玛格丽特·米歇尔（Margaret Mitchell）的《风と共に去りぬ》（*Gone with the Wind*，中译名《飘》）出现。萨特和纪德是仅有的两位没在1947年“十大畅销书”排行榜上再次出现的作者，尽管对于存在主义的兴趣在知识分子中间仍然火热。雷马克的小说，像夏目漱石的作品集一样，在接下来的3年中，始终是最畅销的书。

除了夏目漱石的作品之外，1946年畅销书排行榜上的日本著作，还包括森正藏的《旋风二十年》，是对日本的战争和破灭道路的新闻式的记录；永井荷风的《腕くらべ》（《掰腕》），一本描写花柳界竞争的小说，写于战争中，当时却未能出版；马克思主义学者先驱与早期的日本共产党员河上肇的自传，河上在战争结束后数月就辞世了；一位著名的哲学家、死于狱中的三木清的评价集《哲学笔记》，由他先前出版过的随笔构成；还有被以间谍罪处死的尾崎秀实的狱中书简集。畅销书榜上有四位日本作家已经过世，他们当中只有夏目漱石亲眼目睹了自己的作品大受欢迎的景象。

悲惨的战败带来了特殊的文化危机：旧的、国家主义的英雄被颠覆了，但是谁能取代他们的位置呢？教科书不得不重写。邮票不得不重新

设计。出版界必须提供新的祖国之子的典范。在这个问题上，河上肇、三木清和尾崎秀实的畅销书协助满足了要求。这三人有不少共同之处。他们都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有联系，尽管他们的知识背景并不相关。他们每人都因为政治原因坐过牢。他们都是有原则的人，体现出独立思考与自治的品性，这种品质在一个大多数人都完全甚至是狂热臣服于独裁政府的国家中，十分罕见而且令人崇敬。

幸运的是，他们的文笔都相当好。河上肇和尾崎秀实尤其是优秀的文体家，而三木清在他的遗著《哲学笔记》中，以他的哲学家同侪们罕见的深入浅出的语言，传达了他对传统、天才、领袖、道德、“意识形态与病理学”、“构筑世界的视点”的见解。此外，这三位作家的确对日本读者有吸引力，因为他们是牺牲者，即使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正是现在发现他们有魅力的同一批人的牺牲品。

三人中最年长的河上肇，早在1916年就广为人知。当时他发表了一篇尖锐抨击经济剥削的《贫乏物语》，这一主题在30年后重又引起了强烈的兴趣。由于从事共产主义活动，在1933到1937年间河上肇被捕入狱，在8年的中日和太平洋战争期间，他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他并没有大声反对他国家的侵略行为，但是他也没有像他往日的许多左翼同志们那样，积极呼应天皇的事业。本来，他已经不见了，当战败之后他再次通过写作大声疾呼的时候，就像是一位传奇人物突然的死后复活。一小股“河上肇热”出现了，包括文章、诗作、书信、狱中回忆以及杂文等都相继出版。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多卷本《河上肇自传》的问世。这部自传秘密写于1943到1945年间，1946年2月开始在一本进步刊物上连载，最终分四卷出版。这部自传被不遗余力地赞扬为在日文世界前所未有，堪与卢梭的《忏悔录》和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史诗媲美。但是这位老革命没有机会见证他自己被完全神化，正如一位批评家所称扬的“选择了困难道路的真理的追寻者”。他死于1946年1月31日，享年67岁，恰好就在他自传的首次连载问世之前。³⁶

48岁的三木清之死，则更为令人震惊。1945年9月26日，他因病死于狱中。三木清死于战争结束6周之后，美国占领军当局释放政治犯生效之前。作为一名折衷主义的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他因窝藏共产主

义友人于1944年被捕入狱。1922到1925年，三木曾在德国学习，在那里与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相识，并且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与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方法论的影响。1930年，他曾因同情共产主义被暂时逮捕过。他的知识追求，使他试图将存在主义与宗教信仰调和起来，日益关注日本的思想体系，尤其是与他同时代的杰出的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的思想（西田寻求将西方哲学理念与佛教禅宗的洞察结合起来），并且倾倒于十三世纪果敢挑战习俗的宗教领袖亲鸾的教义。然而1930年代末，三木清以日本“泛亚主义”使命的辩护者的形象出现，1942年赴菲律宾任日本陆军报道员。他致命的决定——庇护逃亡的共产主义友人，更多是个人行为，而非意识形态行为。像河上肇一样，三木清对于战败后读者的魅力，多半来自他对知识的探求、他的思想境界，以及他人格的力量。³⁷

在遗著畅销书的三部曲中，当然最意味的莫过于尾崎秀实。尾崎曾是位有名的新闻记者，尤其精通亚洲事务。然而在战后将他捧上天的著作，却是很私密性的——他在狱中写给妻女信函的选集，从1941年10月被作为共产国际的间谍逮捕，到1944年11月43岁时被处以死刑为止。尾崎曾是著名间谍理查德·佐尔格（Richard Sorge）在日本最主要的联络人。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佐尔格的报告曾经供给苏联有关日本战略思想的无价情报。尾崎是战争期间唯一因叛国罪被正式审判并且处死的日本人。1945年8月15日之前，他在国人眼中是一个可恶的叛国者，而此后则成了更具传奇色彩的英雄与殉道的烈士。

愤世嫉俗者可能会将尾崎的遭遇，作为公众情绪轻浮无常的例证，但是没人能够否认这些书简本身出奇的魅力。它们所营造的奇妙氛围，被浓缩在了这本集子饱含感情的题目之中：《爱情はふる星のごとく》（《流星般的爱情》），这个题目是由一封书简而得名。在信中尾崎写道：“我活着深深感受到了无处不在的人类之爱。真挚的爱就像是明亮闪耀的星星，映照在我的生命之中。”被处死的间谍的魅力，显然是在共产主义学说本身之外。

尽管尾崎秀实曾经通过与佐尔格的联络为共产国际服务，但是他从未加入过日本共产党。这并未阻碍战后日本共产党将他看作一位“钢铁般的共产主义者”。然而当日共试图宣称尾崎是自己人时，却遇到了强

劲的竞争。尾崎具有革命与乌托邦思想，认为从这场战争中将会产生新的社会主义的世界秩序，这一点毋庸置疑。狱中书简中对此说得很清楚，同样这些作品也很容易使其他景仰者将尾崎视为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这可根本不是令共产主义者愉悦的标签。

尾崎的信从罕见的亲密距离，揭示了一个世界主义者对知识与道义的深思。被捕后，他贪婪地广泛阅读文学、政治、经济和历史著作，包括歌德（Goethe）的著作和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君主论》（*Prince*）。司法当局曾经准备让他起草改变信仰的“声明”，由此尾崎将自己浸淫于日本的经典之中。当行刑日临近，他变得日益对禅宗发生兴趣。然而，毫无疑问，这些出版的书简最大的魅力在于，他对于妻子、女儿所贯注的爱，对与天皇制的“家族国家”相对的真实的、小家庭的热爱。

在被捕之前，尾崎秀实并非是个忠实的丈夫，他从不跟妻子英子分享他的思想，或者告诉她自己的行动。英子对丈夫的间谍工作毫不知情，直到尾崎被捕入狱。在狱中书简中尾崎自己承认，由于他的秘密工作，他并不想要孩子。³⁸ 夫妇两人只有一个女儿杨子，在父亲被捕时杨子12岁。当然，锒铛入狱导致尾崎追逐女性生涯的结束，却使他与妻子和女儿开始了智力与感情上的亲密联系。3年之中尾崎的数百封狱中书简，都是写给妻子和女儿的。在这些书简中，尾崎毫不隐瞒地传达他的思想和情感，坦率地表达他的爱情。这可不是典型的“日本”男人的行为，但是这些书简公开分享情感和智慧的程度，却使许多男人和女人钦佩和羡慕。

事实上，这些书简广受欢迎也表明了另外一种迹象，即战争和战败如何为提升珍视私人情感打下了基础。直到日本投降，国家及其意识形态理论家们一直在指示，个人主要的爱应当是爱国心或曰对国家的爱，最终表现为效忠天皇陛下。直到投降之前，父母、妻子以爱国热情高高兴兴地送儿子和丈夫去打仗、男人乐于为天皇献身的官方神话，一直长盛不衰。后来才有材料逐渐披露：陆海军士兵在兵营收到家乡来信，在黑暗中哭泣；将死的士兵用尽最后一口力气，大声呼唤的是母亲的名字，而不是天皇陛下。在这样的社会情境下，尾崎的狱中书简，即便是在描绘全球革命与世界和平的宏伟图景时，仍然可以被解读为对私生活

重要性的确认。这些狱中书简的坦率、挚爱和睿智，成了夫妇、父女之间吸引人的“技巧”的典范，简直就是与范·德·威尔德迥然不同而又同样解放地强调分享和互惠的互文。

尾崎的出版商，正如威尔德的出版者一样，并未自视清高到对战后出现的爱与浪漫的大众市场视而不见。《流星般的爱情》的出版商小森田一记，其本人就在战时的审查制度中深受其苦。他凑巧还做过3年的女性杂志编辑，敏锐地了解“爱”这个词在女性中至高的召唤力。书的标题，跟当时的许多流行歌曲完全合拍，显然是小森为吸引女性读者特意而为。另一方面，共产主义理论家们，强调尾崎对自由、和平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爱，尽管他的写作，显然也包括思想，实际上与工人阶级少有关涉。尾崎被处死3年后，共产党人举行了纪念集会，他们将纪念演讲录命名为《伟大的爱情》。³⁹

然而，除了共产主义者所强调的革命的爱，与尾崎在家庭关系与知识探求中所呈现的更为私人的、人性的爱，还有第三种更微妙的爱，与尾崎联系在一起。对一位往日的叛国者来说，这蕴涵了一种引人入胜的变形：尾崎日益被视为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一位比自以为是极端民族主义者和狂热的爱国主义分子更加深沉、更加真实地热爱自己祖国的人。毕竟，那些叫嚣热爱日本的人，实际上却把日本引向了灾难，然而尾崎却是极少数足够明智、足够独立并且有足够勇气，与他们对抗到底的人之一。尾崎对祖国的爱，超越了对天皇崇拜的教条，超越了对剥削人的、心胸狭隘的统治精英们的政策的默认。那些在战后强调尾崎爱国的人发现，有一位不可思议的人物，曾经早于他们做过类似的评价。1944年宣判尾崎死刑的法官高田正，在秘密审讯后私下里说起，他不仅视尾崎为一位有理想、有道德的人，而且是一位爱国者的榜样。很难想象，这些话会出自一位死刑宣判官之口。⁴⁰

通过不同的方式，尾崎非凡的品格展示了一种榜样，一种在非常时期日本人的榜样。他满足了大众的需求，一面是日本苦难的偶像，另一面则是希望的象征。从自由主义或者左翼的立场看来，尾崎像两百万士兵和千百万平民一样，是杀人如草芥的、军国主义国家的牺牲品。然而，相对于受害者的具体身份而言，受害者的具体感受显然不那么受人关注。此后，尾崎的妻子和女儿，将会在保持尾崎的声名方面起到积极

有效的作用。作为烈士的遗孀和遗孤，她们仅凭自己的身份，就能提升公众对牺牲的关注度。

同时，像任何真正的殉道者一样，尾崎对他的景仰者来说，成了希望的象征。他关于世界革命与终极的“大同世界”的观念，带有惊人的乌托邦性质。在战败的绝望中，他极易被当成是许多日本人正在摸索向往的那个“光明的”新世界的动人幻象，以致3年间，《流星般的爱情》始终位于畅销书排行榜上。⁴¹ 尾崎的未亡人在为1946年初版简写本《狱中书简》作序时，凝练地传达出了这种情绪。她序言的题目，就像这部书名本身，唤起了时代的梦想和希望：《我坚信黎明即将到来》。⁴²

女英雄与牺牲者

女性作家也为早期的畅销书榜增辉不少。战败后日本放映的最早的好莱坞电影之一，是《居里夫人》（*Madame Curie*），由葛丽亚·嘉逊（Greer Garson）主演，根据这位著名科学家的女儿伊芙（Eve）所写的传记改编。1947年，由于影片广受欢迎，传记本身的译本，也登上了“十大畅销书”榜。居里夫人在一个迄今为止“男性的”知识分子领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本身对女性就是极大的鼓舞，她成功的故事，对渲染性别平等问题，具有不可估量的效果。然而这故事还是可以想见的最高尚的罗曼司，不仅包括玛丽·居里与科学家丈夫皮埃尔之间的夫妇之爱，还有他们对伟大思想的平等分享。

1947年，一位真正的日本女性的名字，也出现在畅销书排行榜上。宫本百合子，是位多产的作家与不屈不挠的激进活动家。她年轻的丈夫宫本显治，是少数拒绝放弃信仰的战前共产主义者之一，因而自1933年到1945年10月，一直被监禁狱中。作为被独裁政府逼迫与丈夫隔绝的女性，宫本百合子成了牺牲和苦难的化身。作为一名忠实的妻子，她不仅等待丈夫获释，而且积极分享丈夫激进的政治见解，她同时是男女爱情与女性解放的具体体现者。

超越她著名的婚姻之上，宫本百合子的惊人才华与巨大能量，使她仅凭借自身就成为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1916年，年仅17岁的大学生百合子，就是一位有名望的作家，她出版了一部名为《贫しき人々の群》（《贫困的人群》）的小说。从1927年起，百合子在海外度过了3

年，大部分时间是在苏联。1932年到1942年间，她因左翼活动5次被捕入狱，在狱中的时间超过两年。1942年，由于发热虚脱并且陷于昏迷，她才获释出狱。后来百合子身体状况一直欠佳，导致1951年她过早离世，年仅52岁。

战后，尽管宫本百合子身体虚弱，还要无休止地为共产党的组织活动操劳，她仍然设法写出了一连串广为人知的文章、故事和小说，生动体现了左翼人士对战败以及混乱的旧政权予以回击的狂热能量。《播州平野》，是百合子对日本投降后自身活动少有掩饰的记录，一直是对战后景象最著名的描摹之一。这部中短篇小说在主题和风格上，皆是由黑暗转向光明，由绝望转向希望，由混乱无序转向目的坚定。《风知草》，这部最畅销的作品，描写了百合子与宫本显治重新团聚后的激情岁月，他们以极大的乐观主义投身到共产主义活动中去，为创建一个真正的新日本而奋斗。数年后，百合子写给她狱中丈夫的数千封信件的选集出版了，受到评论界的好评，题目为《十二年の手紙》，堪称尾崎秀实《狱中书简》之女性主义与人权运动的翻版。⁴³

随着时间的推移，占领军当局的审查官开始允许出版者在出版战争资料方面享有更大的自由。希望的想象与和平的梦想，找到了更为煽情的新的表述方式。1948年，当甲级战犯审判终于接近尾声，出现了3本畅销书，万花筒般地提供了关于牺牲者意识问题的不同的图景。一本是太宰治的《斜阳》；一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的《罪与罚》的日译本；第三本是永井隆的《遗孤人间》，后者是占领军当局最早允许出版的有关原子弹爆炸的书之一。永井隆，一位年轻的科学家，¹⁹⁷因长崎的核辐射而生命垂危，以他对核毁灭与未来救赎的反省打动了日本人。他对自己死后年幼的儿女将有何遭遇的沉思，成为了第二年的另一本畅销书《长崎の钟》的内容，该书在经过盟军最高统帅部审查官反复删改之后终于出版。

像长崎的许多日本人一样，永井隆是一位基督徒。讽刺性的巧合是，他还是一位放射医学的大夫，在长崎原子弹爆炸之前就曾受过辐射沾染。他的妻子死于原子弹爆炸，而他自己则于1951年去世，年仅43岁。因而他作为科学家、基督徒和受害者，能够以一种独一无二的视角对核时代进行书写，他在生命后期直面“原爆”痛苦的耶稣受难般的经历，



信奉天主教的科学家永井隆，1951 年因核辐射去世。永井由于撰写了思考核时代意味的众多著作，被推崇为“长崎的圣人”。永井的妻子死于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在永井留下的照片中，他经常躺卧病榻，身旁是年幼的儿女。

使他在有生之年，赢得了“长崎的圣人”的称号。罗马教皇曾嘉许过他。海伦·凯勒（Helen Keller）曾到他的病床前慰问，裕仁天皇也曾亲自驾临探望。1950 年，《长崎の钟》被拍成电影，电影主题曲流行一时。

198 永井隆的看法接近于神秘。本质上，他将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看作是耶稣基督想要使世界恢复理性的行为。第二颗原子弹落到一个有长期基督教传统的城市，只能使他更为确信神的干预。在一段典型的启示录风格的文字中，他质询道：“难道长崎不正是被选择的牺牲者，正如没有瑕疵的羔羊被宰杀，作为完全烧毁的祭品放上神坛，以弥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国家的原罪么？”

激进的日本人发现，这样的宗教宿命论虽然说不上昏庸愚昧，但是并不合口味，然而即便是他们也不能否认，永井隆对和平主义情绪在日本崛起的贡献。同时，永井隆饱含感情的文章，他戏剧般地殉道式的慢慢死去，以及这些有关“原爆”体验的作品的迟迟出现，恰好是在胜利者对日本的反和平、反人类罪行展开审判裁决之时，实质上助长了日益

增强的受害者意识。在此情境下，战争本身成了最大的“施害者”，当日本人具体化身为在“原爆”毁灭的城市中濒死的圣人般的父亲/医生/科学家之时，就以现代战争最典范的牺牲品的面目出现了。这就为日本人悲惨受害与高贵牺牲的熟悉意识，找到了新的象征。那么在这样的氛围中，电影版《长崎の钟》的主题曲，交由创作感伤军歌的著名作曲家古关裕来完成，就并不令人吃惊了。⁴⁴

1950年，当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裸者与死者》的日译本出版并迅速成为畅销书时，日本读者首次获知了一位美国军人对于太平洋战争不加掩饰的看法。然而，梅勒这部粗犷坚毅的杰作，却在一部战争中死亡的大学生们遗书选集面前黯然失色。这部遗书集由进步知识分子编选，题目很有召唤性：《きけ わだつみのこえ》（《听，海神之声》）。这一将战争语言转化为和平语言的非凡实践，其灵感源于一种信仰：这些从战争内部发出的隐秘的信息，将会被解读为对和平的动人的呼唤。这部书信集很快上升到排行榜的前几名，而且几乎立即成为了一部同名电影的脚本。

《听，海神之声》及时开启了一扇双向的大门，敞开过去，又通往 199 未来。战死者家属成立了“わだつみ会”（海神会），这本书也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一再重印。全书总共包括约 75 通信函，由自由主义与左翼的学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精心挑选。它们有文采，有反思，有内涵，而且出奇地哀婉动人，因为读者知道这些年轻人将在实现他们显见的诺言之前就会死去。尽管他们是在军事审查下写的信并且过了关，有时还刻意迎合为祖国献身的使命，但是在他们的信中，仍然透露出潜在的生之渴望，而非对死亡的向往。这本选集压倒一切的基调，是一种生命的浪费感和悲剧的损失感。《听，海神之声》被辑录为一篇反战宣言，由于它的出现正当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决定让日本重整军备以及反美“和平运动”在日本兴起之时，大大提升了其反战的冲击力。

表面看来，将战时书写转化为和平宣言，很像是将“重建”、“光明”、“文化”、“新”等战争口号继续运用于和平年代。其实，这种选集的出版情形要复杂得多。无论编辑者的意图为何，《听，海神之声》使一种十分接近于军国主义者虚构的牺牲形象变得不朽。他们都是纯洁的年轻人。他们的死是高贵的。他们不应当被挑剔，的确不该指责他们没

有反抗军国主义。是他们的死，而不是那些可能被他们杀死的人，博得了关注，而且真的是悲剧性的。其实，在这个对战争的封闭性视野中，没有非日本人的受害者在场。更有甚者，正是由于学院派编辑们的阶级偏见，凸现这些年轻人的文采，他们作为精英大学生的社会地位，才使得他们的死如此引人瞩目。这些年轻人被选做哀悼的对象，因为他们善于表达，而且因为很容易联想到他们是日本未来的领导者。

在永井隆的作品中，主要是依据战争对日本的破坏性后果，而对战争进行理解和批判。《听，海神之声》的编辑者们从一开始就明了，他们所承载的意识形态的暧昧含混，因为他们的选集向有前例。这不是第一次，甚至不是第二次出版精英的学生兵们的书信了。一部相似的选集，被命名为《はるかなる山河に》（《在远方的山河》），于1947年出版，曾经销售约7万册，后来因受到使战争思想永存的批判而绝版。这200本选集，专门拣选了日本顶尖大学——东京帝国大学学生们的信件，来源基本上是1944年间定期发表在东京帝国大学报纸《帝国大学新闻》上的信函。

事实上，尽管1950年书信集的编者，也留心在他们的选集中收录其他大学学生的信件，尽管他们有热切的反战和反军国主义的意图，但是他们都不能真正摆脱过去的历史。甚至是书信集的题目，也传达出对过去的暧昧不明的、无言的回响。《听，海神之声》，就是一句军国主义者喜好引用的召唤性的名言，出自八世纪的一部伟大诗集《万叶集》⁴⁵。这些语言的桥梁，对于维持身份认同和生活目标是如此至关重要，的确可怕，因为它们承载了一种暧昧不明的转换。人们利用它们来逃避过去，并且向新的目标迈进。同时，它们也包含了某种可能性，甚至是诱惑，那就是——重蹈覆辙。

注释：

1 讲谈社编《昭和・二万日の全记录》（东京：讲谈社，1989），第7卷，pp.155, 167, 227, 237, 267, 281, 287, 325；东京烧迹闇市を记录する会编《东京闇市兴亡史》（东京：草风社，1978），pp.16, 34-35, 112-113。这两种文献下引为SNNZ与TYKS。感谢曾为占领军工作的Herbert Passin，向笔者讲述有关酒的趣闻。

2 SNNZ 7:281.

3 TYKS, p.43; SNNZ 7:198-199.

- 4 TYKS, pp. 34–35; SNNZ 7:167.
- 5 朝日新闻社编《声》(东京:朝日文库,1984),第1卷,pp.253,264–265。亦参见 TYKS 所引“东京的写照”,pp.55–57。另一首被歪曲篡改的歌曲是《元寇》(这首歌在黑泽明爱国主义的大后方电影《最美》中意义重大),歌词由抗击外国侵略者变成了斥退乞丐。
- 6 例如,可参见《协力新闻》1946年1月号对各式谚语的运用。
- 7 败战后充满寓意的纸牌游戏,有些纯粹就是政治讽喻,参见《别册太阳 いろはかるた》1974年冬号,pp.85,87,102–104;《协力新闻》1946年1月号(尽管刊名像报纸,其实这是一份“短命”的进步刊物);《漫画》1947年1月号;《日本ユーモア》1948年1月号;收入每日新闻社编《昭和漫画史》(东京:每日新闻社,1977),1936–1945年及1946–1950年部分,未标注页码。
- 8 有关战败初期的所有文化史著作中,几乎都提到了《リンゴの歌》。例如,参见平凡社编辑部编《昭和世相史 ドキュメント 战后编》(东京:平凡社,1976),pp.265–278 [下引为 SSS]; TYKS, pp. 50–51; SNNZ 7:155, 203;《战后体验》(东京:河出书房,1981;《人生读本》系列之一),pp.55–59;日本ジャーナリズム研究会编《昭和“发言”の记录》(东京:东急エージェンシー,1989),pp.104–105。
- 9 竹前荣治《战后デモクラシーと英会話——〈カムカム英语〉の役割》,收入思想の科学研究会编《共同研究・日本占领》(东京:德间书店,1972),pp.131–146。竹前荣治是占领时期日本学界的资深学者,他本人深受这一广播节目的影响。亦参见 SNNZ 7:207。
- 10 战前与战时标语口号的概览,参见森川方达《帝国ニッポン标语集 战时国策スローガン・全记录》(东京:现代书馆,1989)。
- 11 讲谈社编《讲谈社の歩んだ五十年(昭和编)》(东京:讲谈社,1959),p.562;森川《帝国ニッポン标语集》,p.81。亦参见福岛铸郎《战后杂志发掘 焦土时代の精神》(东京:洋泉社,1985)一书对讲谈社1945年11月号《讲谈俱乐部》杂志的摘引,pp.102–103。
- 12 例如参见遣返士兵的来信,朝日新闻社编《声》第1卷,pp.102–103,107–108。
- 13 《声》,第1卷,p.262。对战争年代的“桃太郎故事模式”的分析,参见 John W. Dower, *War Without Mercy: 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 (New York: Pantheon, 1986), pp. 251–257。
- 14 对战后“文化”概念的引申论述,参见平野健一郎《战后日本外交における〈文化〉》,收入渡边昭夫编《战后日本的对外政策》(东京:有斐阁,1985),pp.339–366。
- 15 森川《帝国ニッポン标语集》,pp.14,15,45,93;亦可参见同书 pp.17,41,84。
- 16 此处借鉴了美国马里兰大学 McKeldin 图书馆 Gordon Prange 文库中,有关占领期出版物的未公开发表的期刊索引。
- 17 森川《帝国ニッポン标语集》,p.18;亦可参见同书 pp.15,24,33,80,85。
- 18 《协力新闻》1946年1月号。
- 19 本书第十四章将探讨出版审查制度。有关出版物资匮乏的问题,参见讲谈社编

- 《讲谈社の歩んだ五十年（昭和编）》，p. 559；亦可参见塩泽实信《昭和ベストセラー一世相史》（东京：第三文明社，1988），p. 114。
- 20 *SNNZ* 7: 192–193；福岛《战后杂志发掘》，p. 52；塩泽《昭和ベストセラー一世相史》，p. 114。
- 21 福岛《战后杂志发掘》，pp. 40, 260–262。
- 22 《讲谈社の歩んだ五十年（昭和编）》，pp. 509–510；福岛《战后杂志发掘》，pp. 90–97。
- 23 福岛《战后杂志发掘》，pp. 23–24, 53–55；*SNNZ* 7: 192–193；奥泉荣三郎编《占领军检阅杂志目录·解题 昭和二十年—二十四年》（东京：雄松堂，1982），此文献是对美国马里兰大学 McKeldin 图书馆所藏日本占领期受占领军审查出版物文库的导读。
- 24 《日本统计年鉴 1955/1956》，p. 459 图表 257；奥泉荣三郎编《占领军检阅杂志目录·解题 昭和二十年—二十四年》，pp. 23, 25。有关译著的数目，参见 Nicholas J. Bruno 未公开发表的会议论文，“Press Reform in Occupied Japan (1945–1952)”，1989 年 10 月 21 日 Mid-Atlantic Region 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第 18 次年会。数据报告的出处，见 Press and Publications Branch, Civil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Section, in the SCAP archives in the National Archives (Box 5256, folder 12)。
- 25 福岛《战后杂志发掘》，pp. 199–201。这一珍贵文献，收录了战后初期许多杂志的发刊辞和目录（pp. 199–527）。
- 26 福岛《战后杂志发掘》，pp. 202–203, 376–379；有关《女性》杂志的论述，亦可参见同书 pp. 55–57。
- 27 福岛《战后杂志发掘》，pp. 218–223。
- 28 同上书，pp. 242–247。
- 29 同上书，pp. 264–267。
- 30 福岛《战后杂志发掘》，pp. 279–282。1944 年，对《改造》与《中央公论》的压制，参见同书 pp. 82–85。
- 31 《世界》1946 年 1 月号，pp. 4–6。有意思的是，《世界》的发刊辞，并未像进步派与左翼通常那样提及战前的抵抗运动，而是引述了保守的明治《御誓文》，作为日本本土存在民主传统的重要例证。
- 32 塩泽《昭和ベストセラー一世相史》，pp. 97–100；*SNNZ* 7: 155；朝日ジャーナル编《ベストセラー物語》（东京：朝日新闻社，1967），上卷，pp. 7, 145。1981 年，这本会话手册的畅销记录被黑柳彻子的《窓ぎわのトット》所打破。1946–1987 年间的十大畅销书目，收录于塩泽《昭和ベストセラー一世相史》，pp. 264–274。
- 33 见田宗介《现代日本の精神构造》（东京：弘文堂，1965），pp. 72–85，尤其是 pp. 77–79。亦可参见植田康夫《现代の出版》（东京：理想出版社，1980），pp. 156–159。
- 34 参见《之后》英译本，Norma Moore Field: *And Then* (Putney Vt.: Tuttle, 1988), p. 187。
- 35 参见《门》英译本，Francis Mathy: *Mon* (Putney Vt.: Tuttle, 1972), p. 34；对照 pp. 61, 127, 134–136, 169。
- 36 前引之《ベストセラー物語》，上卷，pp. 25–34。

- 37 1947 年，三木清初版于 1941 年的另一部文集《人生论笔记》，取代《哲学笔记》登上了畅销书的排行榜。
- 38 Chalmers Johnson, *An Instance of Treason: Ozaki Hotsumi and the Sorge Spy R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36。这部著作是对尾崎秀实的思想与活动的透彻研究。
- 39 《ベストセラー物語》，上卷，pp. 36 - 37; Johnson, pp. 205 - 206。
- 40 Johnson, p. 198; 对照 pp. 201, 214, 286。
- 41 尾崎秀实的乌托邦理想的绝佳例证，参见 Johnson, pp. 195 - 196。
- 42 《ベストセラー物語》，上卷，p. 35。尾崎秀实是黑泽明战后第一部影片《我对青春无悔》的主人公的原型。
- 43 对宫本百合子《播州平野》的“女性主义—人道主义”视角的深入分析，参见 Susan Phillip, “Beyond Borders: Class Struggle and Feminist Humanism in *Banshū Heiya*”,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19. 1 (1987): 56 - 65; 亦参见 Noriko Mizuta Lippit, “Literature, Ideology and Women’s Happiness: The Autobiographical Novels of Miyamoto Yuriko”,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10. 2 (1978): 2 - 17。
- 44 《ベストセラー物語》，上卷，pp. 71 - 80。永井隆的《长崎の钟》有英译本。参见 William Johnston, *The Bells of Nagasaki* (Tokyo: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84)。亦可参见 Paul Glynn, *A Song for Nagasaki* (Hunters Hill, N. S. W., Australia: Catholic Book Club, 1988)。永井启示录式的宣言，见 Glynn 前引书，p. 117。
- 45 《ベストセラー物語》，上卷，pp. 108 - 117。本书第十六章将对这些书信集进行深入分析。